

中美建交给 中国与世界带来深远影响

□ 刘建飞

核心阅读

1978年12月15日《中美建交公报》发表，结束了两国无邦交的异常状态。回顾40年来中国与世界

的变化，这个事件的重大历史意义越来越凸显。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许多方面已经有合作共赢，只要两国不陷入“冷战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双方就有合作的空间和机会。

1978年12月15日《中美建交公报》发表，结束了两国无邦交的异常状态。回顾40年来中国世界的变化，这个事件的重大历史意义越来越凸显。

中美建交首先深刻影响了中国。公报发表后第3天，12月18日，对中国来说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际上，这两件大事都是邓小平亲自参与、推进的，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

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就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而改善对美关系与这个进程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改革与开放本来是内容不同的两个事物，但都被中国共产党人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中国要发展，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改革。那么改什么？怎么改？在经济体制层面，就是要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改。党的十四大明确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要转向市场经济，就必须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这是对外开放深层次的要义。邓小平在启动对外开放前后多次强调，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过去学苏联是吃了亏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篇纲领性文献中，邓

小平强调：“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习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1980年代末，许多国家都搞过改革，但成功的不多，而中国的改革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如果总结经验，可以说，有开放相伴便是重要一条。

开启对外开放时，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早就存在。然而，1960年代同法国建交，1972年同英日德等西方大国建交，都未同对外开放紧密联系起来。而美国则不同，它不仅是实力最强的发达国家，而且是现行国际体系的最重要主导力量。同美国建交并进行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层面的深度交流合作，等于中国要同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平相处，互利合作，并且要身在其中。经过40年的发展开放，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广泛而深厚的共同经济利益，两国在贸易、投资、货币等方面都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攸关的合作伙伴。这种合作关系也惠及了世界经

济，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

中美建交促进了中国对外开放，同时，还极大地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一直有为维护世界和平作贡献的情怀。中国搞现代化建设更需要集中精力谋发展、推改革，这就需要尽可能排除外部干扰，为此，就必须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而美国是对中国外部环境乃至整个世界局势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中美关系发展对两国开展安全合作、抑制苏联霸权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解除后，中美在维护世界局势总体和平稳定、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伴随着对外开放和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同世界各国关系的改善，中国对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认识到和平与发展而不是战争与革命是当今时代主题。产生这种认识，与在同美国的交往中加深对美国的认识有很大关系。邓小平在分析制约战争的因素时强调美国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时代主题观的变化对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家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之一。然而，台湾问题历史性地渗入了美国因素，解决台湾问题不可能回避美国因素。同时，解决台湾问题也必须考虑对外开放、维护和平稳定外部环境和世界和平这个大局。正是从大局出发，同时也是从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两岸发展的现实出发，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统一的方针，后又在和平统一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为推进国家统一大业开辟了全新的局面。

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历史任务都与中美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美国出于自己的全

球战略和国家利益在这三大任务上不时地对中国进行干扰和制约，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大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冷战思维，危害我国安全和发展利益，但中国从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需要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在1980年代末美国率领西方多国对我国进行制裁，双边关系跌进低谷的时候，邓小平强调：“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那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中国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后，仍然需要一个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对发展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战略指导意义。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和矛盾，存在纠纷、摩擦当属正常现象，甚至战略竞争的一面增强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两国走向战争或者冷战，不仅会导致两败俱伤，严重危害两国人民的福祉，而且还会危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全球化时代和核时代，像中美这样的大国，必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共处共进。因此，管控好两国间的分歧，确保两国不走向全面对抗，是两国的共同责任。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许多方面已经有合作共赢，只要两国不陷入“冷战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双方就有合作的空间和机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效管控分歧，确保不走向全面对抗，既是一种合作，也是一种共赢，而且是更需要战略智慧的合作。



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于1995年，是当今世界唯一处理成员间贸易关系的多边国际组织，目前拥有164个成员，贸易总额达到全球的98%，有“经济联合国”之称，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经贸环境很不确定，WTO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关于WTO的改革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而中国应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平稳运行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WTO 面临生存危机

当前，WTO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一方面，WTO的权威性受到严重威胁。美国绕过WTO提供的磋商与争端解决机制，直接利用其国内法，采用单边措施对其他成员加征关税。自2018年3月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将战火从双边烧到多边。作为WTO创始成员的美国，本应该为维护WTO秩序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现在却成为WTO最大的挑战者。如果其他成员都如此，无视WTO规则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处理国际贸易关系，那么WTO的权威性将荡然无存。

另一方面，WTO争端解决机制即将瘫痪。WTO争端解决机制被喻为WTO“皇冠上的宝石”，是WTO最重要的职能，其在解决成员方国际贸易纠纷、平衡成员方利益、促进WTO协议的执行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现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几乎难以运行，该机制的上诉机构成员原本有7位，由于美国一再行使否决权阻止WTO上诉机构补充人选，目前该机构的成员只剩3位。如果这一情况持续下去，上诉机制将无法运作，WTO将失去它的“牙齿”。

WTO正在经历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也是二战以来全球贸易体系遭受的最大冲击。纵观世界贸易史，贸易往往与武力、战争及霸权联系在一起，二战后签署的关贸总协定（WTO前身）建立了以承诺为基础、以互惠为原则的全球贸易新秩序，用一种新的方式促进了世界和平。WTO或者说其背后所承载的全球贸易秩序对于世界经济乃至人类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WTO 亟须全面改革

尽管有很多干扰因素，但也不能否认WTO有其自身的问题。首先，谈判结构效率低。WTO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所有多边协议必须获得所有成员同意才能通过，因此，自其创建以来几乎没有再产生有意义的多边协议。其次，争端解决程序有其局限性。虽然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运行得到了WTO成员方的普遍认可，但是其上诉机构裁决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却引发担忧，公平与合理的问题也在实践操作中不断显现。再次，制度漏洞凸显。当一套国际制度确立之后，各成员都会寻找既定制度中的漏洞，WTO的宗旨是降低关税壁垒，促进自由贸易，但是许多国家改用非关税政策，虽然没有违反WTO的法律，但是同样会扭曲贸易，破坏了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

在当前紧张的形势下，WTO改革备受关注。需要指出的是，WTO的改革并非新话题，只是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2018年下半年以来，已有WTO成员提出了改革立场或者系统性的改革方案；欧盟、加拿大提出了系统性改革方案，日本牵头与美国、欧盟发布“美欧日共同声明”提出改革主张；WTO十二国和欧盟代表发表关于WTO改革的联合公报。



WTO 改革：新压力与新机遇

□ 文 洋

WTO 改革之于中国：压力与机遇并存

在WTO改革进程中，中国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方面，努力维护世贸组织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在WTO改革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努力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中国在WTO改革中的立场与策略，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新的压力又是新的机遇。

妥善应对压力，防止落入“陷阱”。一方面，坚持WTO改革的方向必须是中立的，不能成为个别成员谋取私利的工具。另一方面，维护国家利益。对于规则的制定应该具有前瞻性，充分考虑到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在关乎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不能让步。

直面问题，转危为机。对于那些关于中国的合理关切，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可以对一些不影响重大利益却能消除分歧的问题进行协商。中国对外开放40周年的经验表明，外部环境的压力往往能转变为我们内部改革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应积极利用WTO改革的契机填补国际规则空白，例如国际技术转让规则目前缺失，而中国又在强制技术转让问题上饱受质疑，中国应该提出国际技术转让多边规则方案，明确强制技术转让的界定，既对国际规则制定贡献“中国方案”，又能避免中国承受“欲加之罪”。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应该在成本与收益之间做出平衡的选择，只要中国在WTO改革中的最终净收益为正，中国就是获益方。

（上接1版）在推动协同创新上下功夫，深入推进民营企业与京津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市场化的协同创新机制，吸引更多京津科技成果来河北孵化转化。在实施品牌质量提升上下功夫，鼓励民营企业创制和采用先进技术标准，培育壮大一批国际一流品牌、一批国内领先品牌。

深入推进企业家队伍建设，着力提升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管理水平。大力弘扬老一辈民营企业家长艰苦奋斗、敢闯敢干、聚焦实业、做精主业的精神，坚持讲正气、走正道，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对标国际、国内行业高端和优势企业，积极推进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创新，开展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努力提高经营能力、管理水平。珍视和维护自身形象，做到致富思源、义利兼顾，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

坚持问题导向，下大力气破解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我们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抓

好落实上下功夫，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红利。

切实抓好“降成本”工作，有效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加大减税力度，不折不扣落实好国家税收减免政策，改进税收征管方式，避免因不当征税导致正常运行的企业停摆。加大降费力度，进一步清理涉企收费项目，坚决查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加大降低要素成本力度，在土地使用、社保缴费、工商业电价等方面落实优惠政策，实质性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切实拓宽融资途径，有效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强金融信贷支持服务实体经济，提高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在银行考核中的权重，切实解决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支持民营企业通过上市、发债、资产证券化和各类投资基金扩大融资，对有股权质押平仓风险的民营企业采取特殊帮扶措施，避免发生企业所有权转移等问题。发挥财政增信撬动作用，规范金融机构信贷行为，对于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不能随意简单地抽贷、断贷，而要千方百计给予支持。

切实深化“放管服”改革，有效破除各种“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深入推进简政放权，优

化政务服务，完善办事流程，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构建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全面放宽市场准入，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严禁随意提高准入门槛，严禁厚此薄彼、差异对待。大力支持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切实严格执行政策，有效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增强政策落实的针对性，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全面“回头看”，及时完善政策，改进工作。增强政策落实的协调性，注意现有政策的衔接配合，注意政策措施的细化量化，注意相关举措的支撑配套，确保各项扶持政策落地、落细、落实。增强政策执行的科学性，坚持管理精准化，正确把握时度效，避免发生安监、环保等领域微观执法简单化，决不能不顾企业运行搞“一刀切”。

切实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有效帮助解决民营企业实际困难。规范政商交往行为，深刻理解亲清二字的内涵，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帮忙不添乱，切实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为、清上加亲。

健全帮扶民营企业的长效机制，畅通政企沟通渠道，搭建信息化网络平台，及时了解民营企业诉求，认真研究拿出管用见效的实招、硬招、新招。加强正确舆论引导，准确把握和宣传“两个毫不动摇”方针，努力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政治环境、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

切实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有效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深化作风纪律专项整治，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一案三查”，严厉打击黑恶势力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危害企业家人身安全的刑事犯罪，严厉打击村霸、行霸、市霸等，依法审判由经济纠纷引发的暴力讨债、绑架、非法拘禁等“民转刑”案件。严格区分经济纠纷和刑事犯罪，依法审慎采取强制措施，慎用拘留、逮捕和查封、扣押、冻结等手段，最大限度减少对产权主体合法权益和正常经营活动的损害影响。强化地方政府诚信履约意识，不得以换届、相关责任人更替等理由拒绝履行签订的各类合同、协议，因政府规划调整和去产能、治污染等政策性因素，造成企业家和企业财产权益受损的，依法依规进行补偿，切实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